

三任华人校长与岭南大学的“中国化”转型

夏泉, 蒋超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岭南大学是我国第一所向国民政府注册立案并收回自办的基督教教会大学, 先后由钟荣光、李应林、陈序经三任华人校长主持校务。他们面临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 凭借出众的治校能力和个人素养, 努力实现岭南大学办学主权(包括校长任命、内部管理与经费筹措)、办学定位(包括立足本土沟通中西文化、人才培养与服务地方)、办学内容(包括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与课程设置)的“中国化”, 积极引领岭南大学向中国世俗教育与本土化的方向发展。在三任华人校长的持续推动下, 岭南大学的“中国化”转型呈现出渐进的特点。

关键词: 岭南大学; 华人校长; 钟荣光; 李应林; 陈序经; 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15)04-0082-07

Three Chinese Presidents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Lingnan University

XIA Quan, JIANG Chao

(College of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Lingnan University was the first one registered i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changed its attribute of Christian University. Three Chinese presidents ZHONG Rongguang, LI Yinglin and CHEN Xujing took management successively. Facing the changeable time background, they worked hard to achieve the sinicization of school sovereignty, including president appointment, management reform and funds raising; the sinicization of education orientation, including East-West exchanges based on Chinese culture, students training and local service; the sinicization of education contents, including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curriculum setting. They led Lingnan University developing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secular education. Under their management, the sinicization of Lingnan University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cessing.

Key words: Lingnan University; Chinese president; ZHONG Rongguang; LI Yinglin; CHEN Xujing; sinicization

收稿日期: 2015-03-16

基金项目: 暨南大学科研培育与创新基金项目(332201412614104)

作者简介: 夏泉(1966—), 男, 湖南临澧人, 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与高等教育研究; 蒋超(1982—), 男, 甘肃临泽人, 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与教会大学研究。

近代中国共有 16 所基督教大学^①,这些大学早期均由教会把持,独立于中国教育主权之外。在 20 世纪 20 年代“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冲击下,教会大学纷纷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教会大学华人校长群体由此产生。目前学界关于教会大学华人校长的研究业已取得一定进展^②,但在深度与个案研究上仍有拓展空间。岭南大学的前身是美国传教士 1888 年创办于广州的格致书院,1927 年 7 月经国民政府获准立案,正式改名为私立岭南大学,成为第一所向国民政府注册立案并收回由中国人自办的基督教大学。之后相继由钟荣光、李应林、陈序经三任华人校长主持校务,他们处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中,凭借出众的治校能力和个人素养促使岭南大学在办学主权、办学定位、办学内容诸方面向中国世俗教育与本土化方向发展,渐次完成了岭南大学的“中国化”转型。

一、办学主权“中国化”

“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使得教会大学被收归国人自办,开始走上自主办学的“中国化”道路。影响大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校长人选、学校管理、经费来源是教会大学“中国化”的重要前提。经过钟荣光、李应林、陈序经三任华人校长的不断努力,岭南大学在校长任命、内部管理、经费筹措方面逐步实现了办学主权的“中国化”。

1. 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积极推进办学主权的“中国化”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曾颁布《私立大学规程》,明确私立学校的设立必须呈报教育部批准^[1],但教会学校并不理会,岭南大学仍在纽约注册。^[2]岭南大学独立于中国教育主权之外的状况让参与校务的钟荣光、李应林深感不安,他们酝酿将学校收回自办。钟荣光提出准备自办的三步工作计划:一是“国人参与校务,供给意见,相助为理”;二是“国人具有实际负担,筹措一部分经费”;三是“勉力自立,使主权属诸国人”。^[3]并主张由中国人自行筹组董事局主持校务。

1922 年 2 月,中国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非基督教运动”,在“非基督教运动”后期,国人对“收回教育自主权”的诉求如火如荼。钟荣光、李应林顺应时势,在 1926 年 4 月的纽约董事局年会上,提出岭南大学应向中国政府申请立案获得通过。之后,部分岭南大学校友开会确定由李应林、林逸民、陈肇祥、黄启明、关恩佐、招观海、司徒卫、韦懿、

陈廷恺九人组成委员会,以“研究中国发展过程中学校的前途问题”,后经董事局同意改为同学顾问部。^[4]同年 9 月 18 日,以李应林为首的同学顾问部向美国董事局请求将行政权交由中国人主持,并致函董事局要求“就地规划一切”,承认岭南大学为基督教的、国际的、私立的、中国人主权的大学。^[5]该年底,美国董事局派出特派员赴广州与同学顾问部商定,先在国内筹组校董会,遴选钟荣光为校长,聘李应林为副校长。^[6]随后,美国董事局派代表商谈岭南大学交回中国人自办事宜及改组办法,并订立合约。^[7]

1927 年,国民政府规定,教会大学应由中国人担任校长。^[8]经过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钟荣光被推举为岭南大学校董会主席和校长,因钟荣光忙于募款,又任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外交部侨务局局长,因此决定“设一华籍副校长,实际担任学校行政”^[9],由李应林以副校长名义执掌校长职权。同年 3 月 31 日,校董会向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呈请立案获准,钟荣光成为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李应林为副校长。在钟荣光、李应林的共同努力下,岭南大学迈出了办学主权“中国化”的第一步。

2. 积极实行教育管理改革,推进学校管理的“中国化”

在收回自办后,岭南大学三任华人校长持续进行学校管理方面的改革,如注重中国教员的聘任和学生的招收、倡导信教自由等,这些举措为岭南大学的“中国化”提供了保证。在钟荣光任内,实际主持校务的李应林副校长协同校内外人士筹组校董会,增加了华人校董人数。1927 年 8 月校董会成立,孙科被推举为校董会主席,金曾澄为副主席,校董会由孙科、金曾澄、林逸民、简鉴清、钱树芬、蔡吕、谭礼庭、王怀乐、钟荣光、黄启明、李应林、龚约翰(美)、香雅各布(美)、嘉惠霖(美)组成。校董会成立后,在纽约的董事局改称岭南大学基金会。^[10]1937 年 12 月,李应林继钟荣光任校长后遵照教育部调整全国大学行政组织令,对岭南大学的行政机构进行调整,设教务、训导、总务三处。教务处设注册组、出版组、图书馆、博物馆、自然博物采集所、植物园,训导处设生活指导组、军事训练组、卫生体育组及附设护养院,总务处设书组、会计组、庶务组,分掌全校教务、训导、总务事宜,组织简单严密,行政运用灵活。^[11]陈序经在任内也对岭南大学的行政组织架构进行了改革。三任华人校长对管理机构的调整使岭南大学的管理模式逐步与中国本土大学接轨。

在三任校长的努力下,岭南大学宗教因素日渐

式微。1929年2月,李应林在召开全校教职员追思会时指出,岭南大学“在周三及礼拜日之宗教崇拜,人数日减,且久未举行信徒‘收获会’。”^[12]钟荣光1936年公开提出“信仰自由”,认为“孔佛耶回,有教无类;亚欧非美,天下一家。”^[13]学校在聘任教职员及招收学生时也不以信教为条件,“校内华裔教职员与学生非教徒实居多数”^[14]。在李应林的努力下,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岭南大学基督徒教师的数量大为减少,中国教员成为主力。^[15]抗战胜利复迁广州后,各系系主任及教师已大都是中国人。^[16]外籍教师数量的减少固然与日军侵华有关,但主要原因是在华人校长“宗教信仰自由”理念倡导下,岭南大学已走上“中国化”道路。到陈序经任校长时,岭南大学中国籍教师队伍已十分可观。1949年6月1日,富伦向美国岭南大学基金会报告:“陈校长1948年8月1日就职。……他逐步加强了大学的中国人队伍,同美国人一道参与学校的管理和决策。”^[17]

3. 多方奔走筹措经费,推进办学经费的“中国化”

经费是大学发展的保障。由于岭南大学的私立性和教会性,政府拨款很少,办学经费常捉襟见肘。^[18]岭南大学早期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纽约董事局。1927年收回自办后,原负责筹划学校经费的纽约董事局改为岭南大学基金会,仅负责筹措外籍教员教席费及部分图书、设备费,大部分资金必须由华人组成的董事会和校长筹措。经费问题对三任华人校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钟荣光、李应林、陈序经面对复杂形势,努力筹措经费以保持学校的自立与运行,逐步完成了办学经费的“中国化”。

钟荣光在经费主权决定大学发展这一问题上觉醒最早。他认为,岭南大学收回自办,首先要经济独立,否则还是俯仰由人,^[19]遂奔走于国内外努力筹措经费,足迹几乎遍及南洋每一座城市,还到过美洲不少地方,^[20]1916年共计在美洲成立“岭南学校共进会”30多处。^[21]收回自办后,为彻底实现经济独立,钟荣光通过多种方式争取政府经费支持。在他的努力下,1927年广东省政府首先拨助经费10万元,答允次年再增拨10万元,加上清欠6万元,共计26万元。^[22]1934年6月,教育部允诺向岭南大学理、农、工三学院拨款3.5万元,并先后拨给医学院50万元。^[23]

抗战时期是岭南大学经费最为困难的时期。国内捐款几乎为零,政府补助为数亦少,学费收入又不能太高,^[24]英美援华会和美国基金会经费常因战争

不能如期到达。李应林上任后,为解决经费问题绞尽脑汁,凡是筹款事宜都亲自写信联络。^[25]李应林曾赴重庆要求国民政府教育部拨款,^[26]但因为教育部要求岭南大学“国立化”的目的未达到而一度没有应允。在韶关筹备复校时,美国基金会来电称:“美基会只补助农学院经费,大学停办。”^[27]上述事情深深刺激了李应林,也坚定了其实现经费自主的决心。经李泰初介绍,美国茶商威廉捐助岭南大学法币20万元。^[28]1945年,李应林还争取校董富国煤矿公司老板谭礼庭向岭南大学献产,争取侨商郑植之为改良潮州柑橘向岭南大学捐赠学额。^[29]抗战时期的经费困窘局面培养了岭南大学自立自主的精神,使学校进一步摆脱了对美国基金会的经费依赖,筹款渠道进一步向国内转移,客观上加速了岭南大学经费来源的“中国化”进程。

陈序经于1948年接任校长,此时内战爆发已有两年,社会动荡不安,货币贬值迅速。^[30]同年12月8日,岭南大学总务长伍锐麟在报告中坦陈:“本校财政近况预计至明年正月底止不敷之数约达六万余元,屋宇急待修理者甚多。”^[31]财务危机给陈序经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他上任后,在保持学校办学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争取到了国民政府的资助。^[32]而在钟荣光、李应林任内所建立的经费渠道此时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1949年4月16日,陈序经在报告中指出:“星洲华侨廖光汉捐附小学校舍建筑费港币六万元,刻已交到二万元,余续交齐,又张郁才捐奖学金港币四千八百四十八元四角八分已经收到。”^[33]在钟荣光、李应林、陈序经的持续努力下,岭南大学的经费来源逐步实现了“中国化”。

二、办学定位“中国化”

办学定位直接决定着是一所大学的办学方向。作为一所基督教大学,岭南大学是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如何立足本土培养人才、服务社会,是三任华人校长需要考虑的问题。他们在各自的治校过程中视岭南大学的情况对学校的办学定位赋予新的内涵,逐步实现了办学定位的“中国化”。

1.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凸显中国本位

由于岭南大学的基督教背景,三任华人校长都注重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寻找“中国化”的出路,引领师生关怀民族文化,成为国际性的公民^[34]。钟荣光认为:“本校为美国人开办,已历二十多年,论情应该感谢,论理则不应该长期依赖他人。”^[35]他推崇信仰自由,于基督教义之中撷取平等、博爱等理念,结合

儒家的“大同”古训,教书育人,身体力行。^[36]在积极聘用中国专家的同时,还延揽罗飞云(Carl Oscar Levine)、考活(Charles W. Howard)等外籍教师以发展岭南大学的弱势学科。在教育爱国的前提下,钟荣光主张以“基督牺牲服务”精神办学,正确处理了岭南大学因中西文化差异引发的矛盾。“基督牺牲服务”的办学精神一直影响着继任者李应林、陈序经,成为岭南精神的重要内涵。

李应林提出岭南大学应以神学院为纲,大办医学院、农学院、教育学院或学系,以更好地通过中西文化交流砥砺学生的心灵。在他看来,岭南大学不只是一所基督教教会大学,而是一所国际大学。不仅聘用住在乐昌、曲江的两位神父来校讲授音乐、理化等科目,1946年还与天主教会合作,由天主教会出资,在岭南大学校内建“神甫屋”一座,由天主教会派两名神父到校任教。^[37]在1948年岭南大学发展计划委员会的报告中,李应林开宗明义强调,“本校为基督教私立的国际性大学”。^[38]这种基于中国本位文化的办学定位,使岭南大学学生得以接受多元文化的熏陶,利于他们的全面发展。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凸显中国本位的办学定位,还可从岭南大学的学术科研活动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汲取方面得以窥见。农学院在蔬菜方面,除种植华南知名品种外,还引进如美国甜糯米粟、甘笋等;在树木方面,从澳洲输入了桉树;在农具方面,除中国传统的犁、铲等外,有美制割草机、手扶播种机等;在园艺方面,进行荔枝、香瓜、柑橘等的繁殖试验,还改良了从夏威夷和东南亚进口的许多新品种果树,对广东新兴农业帮助很大。^[39]再如,1929年创刊的《岭南学报》刊载了不少讨论中西文化的论文,如谢扶雅的《莱布尼兹与东西文化》、《道与 Logos》,陈受颐的《十八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鲁宾逊的中国文化观》等。^[40]陈序经于20世纪30年代引发的中西文化论战也是发生在其任教岭南大学时。^[41]

2. 人才培养上的“中国化”

在人才培养上的“中国化”,首先表现为重视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钟荣光在教育过程中对学生循循善诱,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他指出,岭南大学的办学目的乃“欲以世界实用之科学,造成中国领袖之人才,加以几分基督牺牲为人之精神,使学成不至自私自利,出则为社会国家尽力,入则负起岭南母校之责任”,^[42]还认为“打倒军阀与官僚,建立真正之民国,必有赖于青年之学生,此教育之所以急急也”。^[43]在抗战时期,李应林认为大学应以学术为社会和国家做贡献。^[44]在他的领导下,岭南大学实施

战时教育,举办大规模的乡村服务团支援抗战,师生无不以未能直接参与抗战建设及未能与内地人民同甘苦为憾。^[45]

其次是生源的“中国化”。岭南大学的发展自始至终离不开华侨的鼎力资助,招收华侨子弟入读岭南大学,除了有经费方面的考虑,还扩大了岭南大学“中国化”的内涵和外延。岭南大学面向港澳、南洋和欧美华侨,在香港、澳门和越南、新加坡等地都办有岭南分校,又专设华侨子弟学校,华侨均以送子弟回国就读岭大为“最佳选择”。^[46]周钟岐对此评价:“岭南大学乃南方历史悠久的最高学府,办学成绩超卓,尤其对海外华侨的子女,数十年来培育了多少热爱祖国人士、富商、巨子,为祖国负起侨务工作中的一项重大任务。”^[47]

招生对象及层次的“中国化”在陈序经任校长时比较突出。如他所言:“岭南大学不但是要向工农开门,而且是要向华侨及港澳学生开门。”^[48]为使岭南大学更具全国性与国际性,陈序经还面向平、津、沪及其他省份增加招生人数,使岭南大学成为立足岭南、面向全国在大学。在陈序经的主持下,岭南大学朝着国内一流大学的方向稳步迈进。^[49]在办学层次上,陈序经很重视岭南附中的建设,他指出:“岭南大学是慢慢发展的,他的基础在附中,岭南附中的历史比大学还长,大学的发展在附中之后,所以说起来,附中实在是大学的骨干。”^[50]陈序经还准备在国内其他地方甚至海外筹建岭南大学附属中学的分校。^[51]

3. 服务面向上的“中国化”

三任华人校长在任内均鼓励师生服务社会。他们在校内设立专门服务机构,提倡学生自治。抗战爆发后,岭南大学成立抗战服务团,鼓励学生为抗战服务,并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目的,增设有关抗战建国科目,以养成学生的爱国观念。^[52]1938年1月,在李应林的指导下,岭南大学成立战时乡村服务指导委员会,于2月6日至19日、2月26日至5月7日开展了两期乡村服务。^[53]为了解、服务社会,岭南大学在迁移到香港后还组织了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委员会下设社会调查组、民众教育组、农业推广组和战时救援组,调查香港社会和香港儿童福利事业状况,编辑民众读物,参加对难童的教育,协助战时青年农艺院,宣传防毒常识,研究防空建筑等。^[54]不仅支援了抗战,也起到了服务香港发展的作用。抗战时期,李应林认识到医药人才与农业技术人才的重要性。为满足战时需求,医学院五六年级学生在岭南大学迁到香港后仍在内地上课

实习,参与各种实际救护工作;农学院三四年级学生则迁往粤北的乐昌县,以期发展农业教育,同时协助政府从事农村建设。为支援抗战,岭南大学还动员文科师生从事宣传抗战和组织民众工作,大大提高了民众的抗战热情。为更好地提高学生的服务能力,李应林曾计划成立社会科学实习处,希望在实践中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锻炼为抗战服务的能力,^[55]可惜因广州撤课,未能付诸实践。

三、办学内容“中国化”

办学内容涉及学科建设、科学研究、课程设置等方面。三任华人校长在办学过程中重视将办学内容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培养能为中国发展做贡献的学生,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课程设置等方面逐步实现了岭南大学的“中国化”。

1. 学科建设上的“中国化”

在学科建设上,三任华人校长均重视学科的中国特色。钟荣光有感于中国以农立国,而农业落后,为此,在收回自办前,他便决心设立岭南农科大学(后改为农学院)^③,以培养农业人才。^[56]学校设教学、试验、农业、推广四部分,分蚕桑、园艺、田艺、畜牧等系,附设果木种植场、实验农场,钟荣光亲自勘察选址,最后在潮安、香山、海南定点。^[57]岭南农科大学在造就农业专门人才、推广农业科学知识、介绍优良品种、改良蚕稻品种等方面具有一定贡献。^[58]1929年9月19日,钟荣光回校主持校长职务,全体师生在农学院十友堂开欢迎大会,他在致辞中提到:“今中国一百人当中有八十五人为农,可知中国真是以农立国。……纵使农院每年只造成专材五名,十年亦得五十名;但以五十人同心合力,亦可以使一省之农业改观。”^[59]钟荣光以岭南农科大学为依托,使岭南大学在农业教学、科研及成果推广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也使岭南大学部分学科更富有中国特色。

在钟荣光的努力下,岭南大学受广东省政府委托设广东省蚕丝改良局,为发展富有广东地方特色的蚕桑业做出了贡献。^[60]蚕桑科于1927年至1929年间一度扩大为蚕丝学院。岭南大学还成立了牛乳试验室以及岭南牛乳公司,并聘请美国人罗云飞做指导。^[61]陈序经则将文学院的商学经济系扩充为商学院,其下设经济、商业管理、银行学三系,促进了广东商科教育的发展。岭南大学也因此成为拥有文理学院、商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的多科性大学,达到了“全盛时期”。^[62]虽然美国方面并不赞成

根据中国国情设置学科架构的做法,但由于华人校长的坚持以及中国政府的支持,这种做法仍然得以实践,在为中国培养知识人才的同时,也进一步使岭南大学摆脱了教会的控制。

2. 科学研究上的“中国化”

三任华人校长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促进岭南大学的学术研究,努力使科学研究彰显中国特色。1929年,《岭南学报》创刊,刊发的很多论文涉及中国文化研究,如黄菩生的《清代广东贸易状况》、全汉升的《清末的西学源于中国说》、郎敬宵的《清代粤东械斗史实》等。同时,《岭南学报》各卷几乎都有关于岭南文化的内容,并经常出版广东专号,如1937年第六卷二、三合期是《潮州艺文志》。1934年,岭南大学还成立了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机构——中国文化研究室。^[63]在抗战时期,李应林鼓励教员学术研究应体现中国特色,不仅在文学院设立社会科学研究室,还成立了柑橘研究所,^[64]希望通过科学研究促进国家发展。

陈序经认为:“学术的研究,往往与特殊的地域有密切的关系。”^[65]早年在岭南大学任教时,他就十分关注沿海地区疍民问题的研究,并发起成立了岭南社会研究所。在主持校务后,他十分注重与地域特点相关的研究,将在抗战时陷于停顿的西南社会调查所扩充为“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并补充设备,扩大组织,进行有关西南社会经济的专题研究,同时辑校西南社会经济文献,翻译著作,绘制有关图表及模型,从事西南物产资源、西南农村社会经济、土地制度、物价、工商等方面的调查,在短短一年内就出版了《三水疍民调查》、《干栏——西南原始住宅的研究》、《南洋与中国》等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66]

3. 课程设置上的“中国化”

课程设置的“中国化”可以从收回自办前后部分年份的课程变化上窥见端倪。中国文学专业在1917年时包括英文、历史、经济学、宗教、作文、科学、心理学、哲学、政府9门必修课程共计81个学分,其中英文与宗教两门占到23个学分。1924年开设的宗教课程包括基督教伦理学、圣经中之社会道德论、宗教史、旧约史、基督教辩护学、基督言行论和中国宗教史7门。1925年将获得学士学位所需的8个宗教课程改为选修。且自1926年下半年起,不再把宗教课程列为必修。1927年收回自办后,岭南大学按照统一标准开课,其中中国语言文学系开42门,社会科学系史学开22门、哲学开8门,宗教课程基本上已不见踪迹。^[67]课程的宗教因素逐步减

少与早期参与岭南大学校务管理的钟荣光、李应林的努力不无关系。

抗战爆发后,岭南大学适应需要,增设有关抗战建国科目,以训练人才参加抗战及为将来重建之用。^[68]李应林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各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修订了课程设置,特别开设了抗战建国课程,以提高学生的民族意识,培养学生的爱国观念。这些课程包括化学战争、航空力学、战时无线电应用、军事工程、军事救护、战时国际公法、日本政治、战时计划经济、战时教育、国民训练、战时乡村工作、倭寇侵略史论以及危难时期宗教教育等。^[69]在香港时,岭南大学为宣传抗战,开设了“抗战时期等文化事业”专题讲座。^[70]这些课程使岭南大学的课程设置进一步“中国化”。

四、结语

岭南大学建校之初,创办者就有“一俟中国人得有办学之经验及能力,便将学校主权归还”之承诺。^[71]在20世纪初民族主义大潮的激荡下,岭南大学“中国化”的进程大大加速。岭南大学的“中国化”始于钟荣光、李应林进入岭南大学管理层并创办农科、努力自筹经费之时。在国人对“收回教育权”的强烈诉求下,岭南大学向中国政府立案注册,实现了校长、管理、经费的“中国化”。在钟荣光、李应林、陈序经三任华人校长的持续努力下,岭南大学在办学主权、办学定位和办学内容上寻求突破与转型,即立足中国本位沟通中西,加强人才培养方向改革,提升大学服务地方能力,根据国情合理设置课程,重视中国文化研究,学科建设彰显中国特色,加之抗战时期的播迁、国共内战及院系调整等原因,岭南大学教会因素逐渐式微,逐步融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最终实现了“中国化”,成了中国人的大学。

注释:

- ① 这些教会大学是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津沽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华中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合大学。
- ② 代表论著有:吴梓明著《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程斯辉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07年;刘保兄著《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办学思想及实践之比较》,载于《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陈才俊著《华人掌校与教会大学的“中国化”——以陈裕光执治金陵大学为例》,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08

年第7期;黄俊伟著《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教育理念述评——以华人校长为例》,载于《现代大学教育》2010年第5期;田正平著《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载于《文史哲》2007年第3期。

- ③ 农学院是岭南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17年岭南学校农学部创建,1921年岭南学校农学部升格为岭南农科大学,1927年岭南农科大学、岭南文理科大学合并组建私立岭南大学,岭南农科大学成为岭南大学农学院。

参考文献:

- [1]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G].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659-661.
- [2][5][16][17][71] 李瑞明. 岭南大学[M]. 香港: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1997:51,173,114,117,169.
- [3][42] 高冠天. 岭南大学接回国人自办之经过及发展之计划[M]. 广州:岭南大学,1928:7,23.
- [4][9] 何名芳. 岭南人说李应林[G]//李应林教育基金会. 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诞辰100周年纪念. 加利福尼亚:李应林教育基金会,1992:26-27.
- [6] 韦懿,郑国宣. 百折不挠的教育家——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小传[G]//李应林教育基金会. 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诞辰100周年纪念. 加利福尼亚:李应林教育基金会,1992:15.
- [7][10][26][28] 谢琼孙. 李应林校长与岭大[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广州文史资料辑·珠江艺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33-43.
- [8][39] 谭双泉. 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59,79-83.
- [11][45][52][68] 李应林. 二十七二十八两年度校务概况[G]//抗战期间的岭南. 广州:岭南大学,1946:13-14.
- [12][22][59] 岭南大学同学会. 钟荣光先生传[M]. 广州:岭南大学同学会,2003:72-80.
- [13] 李心光. 创办岭南农科大学的爱国教育家:记著名教育家钟荣光博士[G]//卢新勤. 天道酬勤. 广州:华南农业大学,2004:29.
- [14] 简又文. 岭南我岭南[J]. 岭南通讯,1958,(总)19:18.
- [15] 刘天路. 中国基督教大学的世俗化问题[J]. 东岳论丛,2003,(5):35-40.
- [18] 夏泉,徐天舒. 试论岭南大学经费筹措及影响因素[J]. 高等教育研究,2004,(6):84-88.
- [19][20] 廖奉灵. 回忆钟荣光校长[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150-153.
- [21] 陈子铭. 在美洲筹款的“岭南学校共进会”[G]//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广东文史资料精编·

- 下编·第4卷·民国时期文化篇. 广州: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2008:222-224.
- [23] 钟荣光. 私立岭南大学二十五年报告[G]. 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38-1-1.
- [24] 李应林. 复原之回顾与前瞻[G]//抗战期间的岭南. 广州:岭南大学,1946:60.
- [25] 郑保. 亲切的怀念——李校长儿女们的回忆[G]//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诞辰100周年纪念. 加利福尼亚:李应林教育基金会,1992:52.
- [27][29] 龙加林. 李应林对岭南大学的贡献[M]//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广州话旧《羊城今古》精选(1987-2000)(上). 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576-578.
- [30][32] 林元. 忆爱国学者陈序经先生[G]//笛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144.
- [31] 校董会三十七年年会会议记录[G]. 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38-1-20.
- [33] 校董会三十八年第一次常会会议记录[G]. 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38-1-20.
- [34] 吴梓明. 岭南大学与中国现代化[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4·教育.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269.
- [35][43] 胡守为. 钟荣光的爱国思想和教育思想[G]//岭南大学同学会. 钟荣光先生传. 广州:岭南大学同学会,2003:138-142.
- [36] 钟荣光:浪子,猛士与圣徒[M]//王春英,陈朝华. 广东的前世今生.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287-292.
- [37]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广州市志(卷十九)[M]. 广州:广州出版社,1996:239.
- [38] 李圣华. 岭南大学的宗教活动[G]//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广东文史资料精编·下编·第4卷·民国时期文化篇. 广州: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2008:774.
- [40][41][63][67] 陶飞亚,吴梓明. 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214-217.
- [44][55][64] 朱有光. 三年来本校教务之设施与方针[G]//抗战期间的岭南. 广州:岭南大学,1946:16-17.
- [46] 欧安年. 岭南大学首任校长钟荣光[J]. 同舟共进,2005,(1):39-40.
- [47] 华侨教育:岭南教育特色之一[J]. 岭南通讯,1987,(总)104:24.
- [48] 经费管理卷[G]. 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38-3-31.
- [49] 谈火生. 陈序经与岭南大学[J]. 人物,2007,(9):26-29.
- [50] 陈代校长对附中周会同学训词[G]. 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38-1-87.
- [51] 陈其津. 我的父亲陈序经[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182.
- [53] 庄泽宣. 抗战期间岭南大学大事记[G]//抗战期间的岭南. 广州:岭南大学,1946:1.
- [54] 私立岭南大学二十七年度兼办社会教育计划[G]. 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38-1-9.
- [56][58] 李坚,余齐昭. 钟荣光[M]//严如平,宗志文. 民国人物传·第九卷. 北京:中华书局,1997:412-416.
- [57] 陈序经. 有关岭大与钟荣光的几点回忆[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三辑. 广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64:42.
- [60][61] 谭锡鸿. 我所知道的岭南大学农学部[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三辑. 广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64:167-172.
- [62] 余齐昭. 钟荣光先生在收回岭南大学办学权中的贡献[G]//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中山文史·第二十五辑·文化历史资料专辑. 中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1992:275-277.
- [65] 陈序经. 大学教育论文集[M]. 广州: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9:22.
- [66] 黄菊艳. 陈序经的教育思想与岭南大学[C]//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东方振兴与西化之路——纪念陈序经诞辰一百周年论集.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140.
- [69] 私立岭南大学校报(1938年3月31日)[G]. 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38-1-87.
- [70] 私立岭南大学校报(1939年1月16日)[G]. 广东省档案馆藏岭南大学档案:38-2-157.

(本文责任编辑 董志勇)